

◆ 中國文化史導論
◆ 中國歷史精神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錢賓四先生全集

◆ 中國文化史導論
◆ 中國歷史精神

聯經

A89015



錢賓四先生全集²⁹

中國文化史導論

錢 穆 著

錢 穆 著

中國歷史精神

錢賓四先生全集

(29)



於七十六年，以九十三高齡，再重讀全書，稍加修潤，擬重版流傳。七十九年夏，書未梓行，而先生則已溘然謝世矣。

民國八十年，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決定在臺出版先生全集，編委會遂提前整理本書與國史大綱兩種；八十二年並交由臺北商務印書館據之印行最新修訂本。翌年，北京商務印書館亦同時重印此兩書之新版，以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五十年來先生之心願，終獲達成。

又民國三十年先生在重慶中央訓練團有講演稿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原收載國史新論中，先生自言該文原為本書之總綱領。今秉先生意，將此文移入本書十篇之後，以求完整。

本書已將正中舊版重新整理，改正原版若干誤植文字，分段則重新處理，並整理標點符號，主要加入私名號、書名號，重點則酌加引號，以方便讀者閱讀。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胡美琦女士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於七十六年，以九十三高齡，再重讀全書，稍加修潤，擬重版流傳。七十九年夏，書未梓行，而先生則已溘然謝世矣。

民國八十年，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決定在臺出版先生全集，編委會遂提前整理本書與國史大綱兩種；八十二年並交由臺北商務印書館據之印行最新修訂本。翌年，北京商務印書館亦同時重印此兩書之新版，以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五十年來先生之心願，終獲達成。

又民國三十年先生在重慶中央訓練團有講演稿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原收載國史新論中，先生自言該文原為本書之總綱領。今秉先生意，將此文移入本書十篇之後，以求完整。

本書已將正中舊版重新整理，改正原版若干誤植文字，分段則重新處理，並整理標點符號，主要加入私名號、書名號，重點則酌加引號，以方便讀者閱讀。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胡美琦女士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弁 言

「文明」、「文化」兩辭，皆自西方逐譯而來。此二語應有別，而國人每多混用。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羣體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由其羣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即如近代一切工業機械，全由歐美人發明，此正表顯了近代歐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但此等機械，一經發明，便到處可以使用。輪船、火車、電燈、電線、汽車、飛機之類，豈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但此只可說歐美近代的工業文明已傳播到各地，或說各地均已接受了歐美人近代的工業文明，卻不能說近代歐美文化，已在各地傳播或接受。當知產生此項機械者是文化，應用此項機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產出文明來，文明卻不一定能產出文化來。由歐美近代的科學精神，而產出種種新機械、新工業。但歐美以外人，採用此項新機械、新工業的，並非能與歐美人同具此項

科學精神。再舉一例言。電影是物質的，可以很快流傳，電影中的劇情之編製，演員之表出，則有關於藝術與文學之愛好，此乃一種經由文化陶冶的內心精神之流露，各地有各地的風情。從科學機械的使用方面說，電影可以成爲世界所共同；從文學藝術的趣味方面說，電影終還是各地有區別。這便是「文化」與「文明」之不同。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於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人類文化，由源頭處看，大別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農耕文化，三、商業文化。游牧文化發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帶，農耕文化發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業文化發源在濱海地帶以及近海之島嶼。三種自然環境，決定了三種生活方式；三種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種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兩類。游牧、商業文化爲一類，農耕文化爲又一類。

游牧、商業起於「內不足」，內不足則需向外尋求，因此而爲流動的、進取的。農耕可以自給，無事外求，並必繼續一地，反復不捨，因此而爲靜定的、保守的。草原與濱海地帶，其所憑以爲資生之地者不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內部之有阻害，於是而遂有強烈之「戰勝與克服欲」。其所憑以爲戰勝與克服之資者，亦不能單恃其自身，於是而有深刻之「工具感」。草原民族之最先工具爲馬，海濱民族之最先工具爲船，非此即無以克服其外面之自然而獲生存。故草

原、海濱民族其對外自先即具敵意，即其對自然亦然。此種民族，其內心深處，無論其爲世界觀或人生觀，皆有一種強烈之「對立感」。其對自然則爲「天」「人」對立，對人類則爲「敵」「我」對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學心理上之必然理論則爲「內」「外」對立。於是而尙自由、爭獨立，此乃與其戰勝克服之要求相呼應。故此種文化之特性常見爲「征伐的」、「侵略的」。農業生活所依賴，曰氣候、曰雨澤、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類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爲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類之信任與忍耐以爲順應，乃無所用其戰勝與克服。故農耕文化之最內感曰「天人相應」、「物我一體」，曰「順」曰「和」。其自勉則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種文化之特性常見爲「和平的」。

游牧、商業民族向外爭取，隨其流動的戰勝克服之生事而俱來者曰「空間擴展」，曰「無限向前」。農耕民族與其耕地相連繫，膠著而不能移，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祖宗子孫世代墳墓安於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間之擴張，惟望時間之延續。絕不想人生有無限向前之一境，而認爲當體具足，循環不已。其所想像而慚求者，則曰「天長地久，福祿永終」。

游牧、商業民族，又常具有鮮明之「財富觀」。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級數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如是則刺激逐步增強。故財富有二特徵，一則愈多愈易多，二則愈多

愈不足。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商業民族之財富觀則更益增強。財富轉爲珠寶，可以深藏。以數字計，則轉成符號。由物質的轉成精神的，因此其企業心理更爲積極。農人則惟重生產；生產有定期，有定量，一畝之地年收有定額，則少新鮮刺激。又且生生不已，源源不絕，則不願多藏。抑且粟米布帛，亦不能多藏。彼之生業常感滿足而實不富有。合此兩點，故游牧、商業文化，常爲富強的，而農業文化則爲安足的。然富者不足，強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強。以不富強遇不安足，則雖安足亦不安足，於是人類文化乃得永遠動盪而前進。

文化必有刺激，猶如人身必賴滋養。人身非滋養則不能生長，文化非刺激則不能持續而發展。文化之刺激，又各就其個性而異。向前動進的文化，必以前進動進爲刺激；戰勝克服的文化，必以戰勝克服爲刺激；富強的文化，必以富強爲刺激。然動進復動進，克服復克服，富強益富強，刺激益刺激，而又以一種等比級數的加速爲進行，如是則易達一極限。動進之極限，即爲此種文化發展之頂點。古代游牧民族，其興驛，其崩速。近代之商業文化，雖其貌相若與古代之游牧文化大異，而內裏精神實出一致，因此此種文化常感搖兀而不安。

「安、足、靜、定」者之大敵，即爲「富、強、動、進」。古代農耕民族之大敵，常爲游牧民族。近代農耕民族之大敵，則爲商業民族。然人類生活終當以「農業」爲主，人類文化，亦終

必以「和平」爲本。故古代人類眞誠的文化產生，即在河流灌溉之農耕區域。而將來文化大趨，亦仍必以各自給足的和平爲目的。

農業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別，又有新農、舊農之別。何謂大型、小型？古代如埃及、巴比倫等皆小型農國，其內部發展易達飽和點，其外面又不易捍禦強暴，因此古代小型農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獨中國爲古代惟一的大型農國，因此其文化發展，獨得綿延迄於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猶存，堪爲舉世農業文化、和平文化發展最有成績之惟一標準。然中國雖以大型農國，幸得捍禦游牧文化之侵凌而發展不輟。今日則新的商業文化繼起，其特徵乃爲有新科學、新工業之裝備，因此中國雖以大型農國對之，不免相形見绌。於是安足者陷於不安足，而文化生機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然此非農耕文化不足與商業文化相抗衡。苟使今日之農業國家，而亦與新科學、新工業相配合，而又爲一大型農國，則仍可保持其安足之感。而領導當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國家是賴。

今日具此資格之國家，有美國，有蘇聯，與中國而三。美、蘇皆以大型農國而又有新科學、新機械之裝配，然其傳統文化則未必爲農業的。換言之，即未必爲和平的。中國則爲舉世惟一的農耕和平文化最優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則爲新科學、新機械之裝備與輔助。然則中國之改

進，使其變爲一嶄新的大型農國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足感，實不僅爲中國一國之幸，抑於全世界人類文化前程以及舉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絕大之貢獻。

然中國改進，其事亦不易。使中國人回頭認識其已往文化之真相，必然爲絕要一項目。中國文化問題，近年來，已不僅爲中國人所熱烈討論之問題，抑且爲全世界關心人類文化前途者所注意。然此問題，實爲一極當深究之歷史問題。中國文化，表現在中國已往全部歷史過程中，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我們應從全部歷史之客觀方面來指陳中國文化之真相。

首先：應該明白文化之複雜性，不要單獨著眼在枝節上，應放寬胸懷，通視其大體。

第二：則應明白文化之完整性，人類羣體生活之複多性，必能調和成一整體，始有向前之生機。如砌七巧板，板片並不多，但一片移動，片片都得移，否則搭不成樣子。中西文化各有體系，舉大端而言，從物質生活起如衣、食、住、行，到集體生活如社會、政治組織，以及内心生活如文學、藝術、宗教信仰、哲學思維，犖犖大者，屈指可數。然相互間則是息息相通，牽一髮，動全身；一部門變異，其他部門亦必變異。我們必從其複雜的各方面，瞭解其背後之完整性。

第三：要明白文化之發展性。文化儼如一生命，他將向前伸舒，不斷成長。橫切一時期來衡量某一大文化之意義與價值，其事恰如單提一部門來衡量全體，同樣不可靠。我們應在歷史進程之

全時期中，求其體段，尋其態勢，看他如何配搭組織，再看他如何動進向前，庶乎對於整個文化精神有較客觀、較平允之估計與認識。

本書十篇，根據上述意見而下筆，這是民國三十年間事。其中一部分曾在思想與時代雜誌中刊載。當時因在後方，書籍不湊手，僅作一種空洞意見之敍述。此數年來，本想寫一較翔實的文化史，但一則無此心情，二則無此際遇，而此稿攜行篋中東西奔跑，又復敝帚自珍，常恐散失了；明知無當覆瓿，而且恐怕必犯許多人的笑罵，但還想在此中或可引出一二可供平心討論之點，因此也終於大膽地付印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錢穆在無錫江南大學。

修訂版序

本書寫於民國三十年中、日抗戰時期，爲余寫成國史大綱後，第一部進而討論中國文化史有系統之著作，乃專就通史中有關文化史一端作導論。故此書當與國史大綱合讀，庶易獲得著者寫作之大意所在。

本書雖主要在專論中國方面，實亦兼論及中西文化異同問題。迄今四十六年來，余對中西文化問題之商榷討論屢有著作，而大體論點並無越出本書所提主要綱宗之外。讀此書實有與著者以下所著有關商討中西文化問題各書比較合讀之必要，幸讀者勿加忽略。

本書近將重版，余重讀全文，略作修飾。又理出民國三十六年寫於昆明五華書院之筆記兩則附於後。

民國七十六年冬錢穆誌於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三歲。

錢
穆

中國歷史精

神

出版說明

民國四十年春，錢賓四先生在臺北應國防部高級軍官組特約講演，前後共七次，每次兩小時；分別講述史學精神和史學方法、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經濟、國防、教育、地理與人物、道德精神七題。錄音整理後，由先生修潤以成本書。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其間治亂興替，波譎雲詭，常令治史者望洋興歎，有無從下手之憾；而初讀史者，亦每苦於重點之難以把握，以故望而卻步。先生在本書中，以其淵博之史學涵養，敏銳之剖析能力，解此難題，俾讀者得窺中國歷史文化之堂奧。藉由本書深入淺出之敘述，讀者可在短期間內獲得較完整之歷史概念，更有助於深入瞭解五千年來歷史精神之所在，從而認清此一代中國人所背負之歷史使命及應當努力之方向。

民國四十一年七月，本書由印尼耶加達天聲日報印行，為該報叢書第一種。後以臺、港兩地